



臺灣中文學會通訊

中華民國 109 (2020) 年 7 月

✦ 會務報導

- 1 臺灣中文學會第五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紀實

✦ 活動紀實

- 3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三十：
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

✦ 專題企畫

- 19 「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簡介
- 23 英國漢學的現狀與發展 (2010-2020)
——以大學 (學院) 中的研究機構為例

✦ 相關訊息

- 35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三十一預告
——林遠澤《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
- 37 第八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公告
- 39 編後語

34

臺灣中文學會第五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紀實

◎秘書處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 日（週四）
10:00
地點：臺灣大學中文系會議室（臺北市
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主席：梅家玲理事長

109 年 7 月 2 日（週四）上午 10:00，本會第五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於臺灣大學中文系會議室召開，主席為梅家玲理事長。胡曉真副理事長、吳冠宏常務理事、林啟屏常務理事、廖美玉常務理事出席與會。

討論議案如下：

案由一、請討論 109 年度臺灣中文學會年會暨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相關細節。（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

（一）依 109 年 3 月 14 日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日前已徵得成大中文系同意於 10 月 24 日（週六）承辦，議題為人才培育與課程規劃。

（二）請討論主持人、與談人人選，及經費安排。

決議：年會議程稿見附件 1，確定人選委由理事長協商；經費依往例由學會補助 10 萬元。

案由二、本會擬於明（110）年 7 月 29 日

至 31 日（週四至週六）與臺大中文系、華語與比較文學協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Literature）合辦「文學／海洋／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否同意，提請討論。（提案者：梅家玲理事長）

說明：檢附計畫書，見附件 2。

決議：請秘書處洽詢內政部有關會員大會相關規定後，另提理事會討論。

案由三、請討論本（109）年度新書精讀會之安排。（提案者：秘書處）

說明：預計安排林遠澤、鍾彩鈞、洪淑苓諸位先生之著作，請討論研讀順序及承辦單位。

決議：依序研讀林遠澤先生（9 月，東海大學承辦）、洪淑苓先生（11 月，請洪先生決定承辦單位）、鍾彩鈞先生（12 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承辦）

❖無臨時動議，散會。





會務報導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三十： 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

◎蔡佩盈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6 日（週六）
13:30-16:30

方式：遠距視訊（Microsoft Teams）

主持人：廖棟樑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主講人：陳英傑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討論人（依姓名筆畫排序）：

徐國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許銘全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

曾守仁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廖棟樑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紀錄人：蔡佩盈同學（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班）

論文的研究領域集中於宋元明間「盛唐」觀念的發展和演變。我們都知道「盛唐」指涉唐詩史上的黃金時代，南宋和明代復古派的詩人也都主張學盛唐。然而目前學者，對這個問題意識的顯現或義理的闡發，卻未必充分開展。相對來說，英傑的論文除了客觀而詳實地梳理宋明間多樣化的「盛唐」觀念，同時對這觀念如何統領宋明詩學，從而孕育、催生古典詩學中的重要議題，諸如：復古、反復古、學習方法、互文等的關係，都能清楚掌握。沿著這樣的研究路線，英傑近年出版了專書《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賡續、深化既往的研究領域，更進一步瞄準「杜詩學」，結合復古派最具爭議的摹擬問題，其研究結果遂能別出心裁，凸顯不一樣的復古派詩學圖像。

在書中，英傑曾引用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林中路》「林中多歧路」的意象，在這歧路上，其中只有林業工和護林人熟悉殊途歸處。若復古派的自我期許，可類比於林業工和護林人，我們何嘗不可說英傑也是復古派詩學的林業工與護林人？再來將時間交給英傑來發揮。

作者導讀

陳英傑教授：

開幕

廖棟樑教授：

這場精讀會顯然是別開生面的一場。由於新冠肺炎，我們改用遠距視訊的方式，讓來自遠方的朋友也能共襄盛舉。

今天的主講人陳英傑教授，其碩博士

活動紀實

謝謝主持人廖老師，以及徐國能老師、許銘全老師、曾守仁老師，當然也要感謝臺灣中文學會和政大中文系，願意針對我兩年前出版的專書舉辦一場精讀會。得受邀時，我就在想：有關「作者導讀」部分，我應報告兩年前寫書時的想法，還是兩年以來已經有所調整的部分？最後我決定取其折衷，以現在想法來回顧兩年前欲處理的問題，也就是以及兩年過後，我又繼續做了什麼，以及未來可以嘗試的後續研究。

該書寫作期間為 2014 到 2018 年，過程倉促，難免有照顧不周之處。不過，這本小書的寫作，原本是由我的博士論文《宋元明詩學發展中的「盛唐」觀念析論》發展而來。博士論文中，我想解釋「盛唐」在宋明之際詩學史上，具有如何不同的內涵與重要意義。毫無疑問，杜詩是「盛唐」這一時代的重要組成，自然也是我的博士論文不能迴避的研究內容。當時沒能詳盡梳理，這正是現在這本專書想要持續發揮之處。但這本專書還加上了新的問題意識，就是想由杜詩學的角度，去觀察復古派最具爭議性的「摹擬」問題。為了凸顯這個新的問題意識，我們不妨稍微回顧前行相關論述。

首先在傳統認知上，可舉清代影響很大的《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據《空同集》提要：「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在館臣眼中，復古派之所謂「復古」，卻往往脫離不了「摹擬」，而且這種「摹擬」顯然還被貼上了負面標籤。在另一段提要中，「（高啟）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為後人詬病焉」，明初高啟學古、擬古，仍自有其主體性，館臣轉

而批判復古派的摹擬，猶如書法臨摹上的「硬黃雙鉤」。這類資料還有不少，在在可見復古派予人的刻板印象。

民間肇建，「欽定」的政治環境不復存續，上述的刻板印象仍然沿襲下來。例如「五四」時期，陳獨秀〈文學革命論〉（1917）將前後七子稱作「妖魔」，直指其詩為「摹古」、「抄襲」，批判立場，至為鮮明。稍晚，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所說的「復古」、「模仿」，也仍涉及負面的批判語境，他甚至直指復古派的詩作是「假古董」。如果說，上述學者皆非典型意義下的明代文學研究者，那麼，我們或許還應注意宋佩韋（原名宋雲彬）的《明文學史》（1934），因為即使在這部專談明代文學史的專書中，他仍如此形容復古派：「模擬」、「剽竊」、「虛矯」、「膚闊」。

這種復古派予人的刻板印象，流佈甚廣，我們可再舉幾個例子：日本京都大學退休吉川幸次郎教授《元明詩概說》（1963），臺大中文系退休葉慶炳教授《中國文學史》（1987），中國學者袁震宇、劉明今合著《中國文學批判通史：明代卷》（1996），均有類似的表述。

但其次，晚近學者的研究，則有逐漸突破傳統認知的趨勢。我們可分三個層面來看：

一、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省思，如曾守正教授、何宗美教授的系列性研究。其中當然包括了「復古派批評」的部分。

二、「文學史書」的改寫，如龔鵬程《中國文學史》、章培恆與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孫康宜和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

學史》。

案：綜觀上述兩個層面的研究，相對於傳統認知，頗能呈現復古派詩學的立體性、複雜性。這種趨勢，當然也反映到復古派創作實踐的研究，亦即第三個層面：

三、立體性、複雜性的復古派詩歌圖像，如簡錦松教授的研究。他在一篇探討李夢陽的論文中（〈從李夢陽詩集檢驗其復古思想之真實義〉），雖不諱言李夢陽的摹擬疑雲，卻也提出李氏展現了「主體我」。換言之，這是針對復古派的創作實踐，去論其摹擬問題的立體性、複雜性。

沿著簡教授的說法，我們尚可進一步注意：所謂「摹擬之弊」，不僅後人、旁人或今人的觀感，實際上也是復古派詩人早有的「自覺」。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便可拓展出新的研究議題探討：復古派如何「安內攘外」？也就是說，復古諸子面臨流派內部的摹擬之弊，如何省察而救治之？面對流派外部的批評聲浪，尤其時至晚明公安派、竟陵派攻擊「摹擬」的力道，日漸增強，他們又是如何堅守「復古」的信念？這是我延續晚近學者之於傳統認知的轉向，進一步開展出來的新問題。這個「安內攘外」的議題，其核心處，更涉及「古」的魅力問題。這也讓我想到：今日社會，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古典文學是沒有吸引力的，陳舊而落伍，但當時復古派卻是津津有味。與其單純批判復古派「食古不化」，更應該去探討，他們所感知的「古」有何魅力。正是有感於「古」的魅力，方能勇於「安內攘外」。

為何選擇「杜詩學」作為探討上述問題的重要視角？實際上，在明人眼中，復古派的崛起，與「學杜」關係密切。例如：李夢

陽的朋友顧璘說：「今四方學者，各從所授，而杜學多」，稍晚一點的楊慎也說：「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陳束則認為李、何：「力振古風，……一變而為杜詩」，皆可印證。因此，「杜詩」自然也就成為明人談論復古派摹擬問題的一個標靶，據陸深的觀察：「方今詩人輩出極一代之勝，大抵古宗《選》、律宗杜，可謂門庭正、機軸工矣」，所述正是復古派，他又緊接著感嘆：「惜乎過於摹擬」。在另一封書信裡，陸深仍說：「今日《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摭盡矣」，仍把復古派的摹擬，與學杜一事聯繫起來。謝榛當然是復古派要角，他也特別提及學子美者的弊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最後歸結為「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亦可印證。即使在復古派之外，錢謙益引用薛蕙說：「今日作者，摹擬蹈襲，至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謔」，命意相仿。基此，本書的內容大抵可分為兩個方向：第一、梳理明代復古派「杜詩學」觀點，第二、由杜詩學的角度去觀察復古派如何「安內攘外」。

然則，何謂「復古派」？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直接涉及研究範圍的框定，卻不容易給出明確的界定。為此，我則提出了一個「復古派詩學系譜」的觀點。這一系譜包括：李夢陽、何景明，兩人崛起於弘、正之際，俱有志於復古。相沿而下，謝榛、王世貞、李攀龍等人，頗欲紹繼李、何，並有結社之舉。再往下走，胡應麟的詩學鴻圖，頗欲紹繼王世貞，最後許學夷也想要紹繼王世貞、胡應麟。這個詩學系譜的構成，都是依據上述諸人自己的第一手說法。因此，依據這個系譜，我們可以

更堅實地彰顯諸人之間的杜詩學觀念遞承、對話，拉出一個「史」的發展軌跡。換個角度，依其活動年代，我所要探討的，也可說是十六至十七世紀前葉的詩學史。

關於這本書的內容，簡介如下：起頭的第二章，我想反思李夢陽為主，何景明為其附庸的習見圖像。在杜詩學上，他們兩人有共識，但又各有不可退讓的堅持，所以會就摹擬問題，產生劇烈的摩擦。這和杜詩學相關，從而也會涉及詩歌本質的思考，唐詩、宋詩的評價等議題。

第三章專論謝榛。他之論「法」，格外重要，包含字法、句法、章法、用典等形式問題，這其實是大幅拓展了「法」的觀念，較之李、何所論，更臻具體化。但如果詩人過度重視「法」，拘泥於「法」，將「法」和「語」的關係，看得過度緊密，就會使得創作或學習活動變質為模仿、抄襲古人語言，陷入所謂「摹擬太甚」。這也是李夢陽之遭受何景明批判的前車之鑑。我們遂可注意到，謝榛提出了特殊學古方法，那就是不專主或任何一家，主張提魂攝魄，或如蜜蜂採百花釀蜜那樣的靈活姿態，可視為是對「法」的辯證超越。

一般我們會認為王世貞是文壇盟主、詩壇領袖；這是實情。但在第四章中，我想凸顯王世貞的「承上啟下」。承上方面，他對於杜詩的特質，論其「法極」，李夢陽、謝榛俱有類似觀點，但王世貞加上「無跡」，卻是重要的創見。若僅論「法」，易淪摹擬之弊，他遂進層補述杜詩特有一種天衣無縫的理想境界。啟下方面，「無跡」之說，顯然引導了胡應麟後續思辨，所論杜詩的「化境」，當是淵源有自。

第五章特別引用了《林中路》扉頁的題詞，藉以譬況胡應麟杜詩學的特色。杜詩之美，正如一座繁複廣漠的森林，置身林中，既迷人又常不覺令人迷惘，誰才是真正的識途老馬？胡應麟透過細緻的「辨體」，一方面「鑒戒」前人學杜實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還要「重構」杜詩的價值。

第六章聚焦許學夷。據《詩源辯體》來看，許學夷非常關注復古派內外的各種脈動，特能視為「安內攘外」的典型。他身處晚明，回首前塵，更能敏銳洞觀百年來復古派的發展大勢，以其杜詩學、唐詩學回應了流派內部的摹擬問題；對外方面，公安派、竟陵派則開始進入了他的批評視野。

以上的回顧，相當簡略，但總括而言，在個別細部的討論外，這本書欲呈現復古派杜詩學的幾項要點：

一、與現實對話：復古派的詩學，絕非自閉於書齋之內，進行某種冰冷的考古工作，而是緊緊於當代詩壇脈動，對於社群內外的現實詩學處境，俱有清晰的體認。

二、理論與現實的辯證：復古派詩學理論的建構，常是針對「摹擬」的現實問題而發。唯其創作實踐的成果如何，又會導致或推進後續的詩學理論建構。這也就是說，談復古派的詩學，應該注意：它針對什麼具體的創作現象？它的促成、發展，又是受到什麼創作現象的推激？

三、在比較中確立杜詩價值：復古派杜詩學，係在「比較」的框架中建立起來的。故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復古派諸

活動紀實

子不時舉出漢魏古詩、唐詩、盛唐詩、宋詩等，以與杜詩進行比較。杜詩內部蘊含的各種體式之間，何為「正體」？何為「變體」？何為「大變」？何為「小變」？自然也是比較的重點。按照傳統的說法，這就是「辨體」。復古派杜詩學的「辨體」色彩，較之前人，特別濃厚，實為一大特色。

四、重層內涵與動態歷程：所謂「重層內涵」，若以復古派杜詩學的個別論者來說，具有三個面向：「沿承」、「前人」、「發明」。進而若以復古派詩學史或杜詩學史來說，則能呈現一種「動態歷程」，可發現愈到後期，「修正」、「發明」居多，「沿承」則漸趨淡薄。

以學杜和學詩為例，胡應麟談如何學五言律詩，其《詩藪》云：「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法宏贍，音節雄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風神，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真澹，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陵，究竟絕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我們從「先取」、「次及」、「然後歸宿杜陵」中，可以清晰看出一種系統化的學詩方法論，在學詩同時亦是學杜。以許學夷做比較，《詩源辯體》云：「子美五、七言律，命意創句與諸家不同。後之學者欲學子美，必須先學諸家，既而於子美果有所得，然後變調以學之，庶幾不謬。不然，恐徒有重拙之類，不能入其壺奧也」，所謂「必須先學諸家」，乍看似是對胡應麟前說的「沿承」；接著「然後變調以學之」，則可謂對胡應麟的「修正」。修正什麼？許學夷不再是將學杜放在學五律的脈絡中，去共構一套前後相續學詩方法。他表面上強調「先學諸家」，

其實學諸家是一回事，「然後變調」以學杜又是另一回事了。這個「修正」，至關緊要，因為許學夷緊接著講：「今之初學，輒慕子美，及問子美佳處，直兒童之見耳。故予論之如此，此前人所未道也」，可知上述的論見，正是他深深自豪的「發明」。發明什麼？我們繼續追查，《詩源辯體》有云：「盛唐律詩，子美信大，而諸家入聖者，亦是詣極。嚴滄浪云：『詩之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沉著痛快。』此正諸家與子美境界也。又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云云，則諸家境界，寧復有未至耶？元美必欲以子美為極至，諸家為不及，其說本於元微之及宋朝諸公，開元、大曆不聞有是論也」，可知上述的學詩方法論，許學夷將「學諸家」、「學杜」分成兩個系統，正透露出「雙典範」、「雙高峰」的觀念，杜詩誠然自有價值，盛唐諸家亦是不可磨滅的典範。這樣的「發明」，隱然挪移了復古派對以杜甫為高峰的詩學傳統，令人想起清初王士禛的一個觀點，「有宋以來談詩家，乃祧盛唐諸人而專宗少陵。然攷之唐人之緒論，及唐人選唐詩，固未始有宗少陵之說」（郎廷槐《師友詩傳錄》），認為尊杜並非唐代的實況，而是宋代以降層層疊加的結果。王士禛這個觀點，當然與他倡導「神韻說」，互為表裡。回到許學夷來看，我們當能肯定他轉出了一種新的詩學取向，彷彿成為王士禛的前導。因此，我前面才說：這本書雖是討論復古派的「杜詩學」，亦不妨視為十六至十七世紀前葉的詩學史，這是一段由「格調說」到「神韻說」的詩學史。其實，許學夷很少使用「神韻」的觀念術語，但關於「神韻說」的形成，他應是意義重大。

活動紀實

綜觀這樣的討論，或許可以觸發三個值得後續深研的議題：

一、「神韻前史」：誠如前述，許學夷不常使用「神韻」，卻和「神韻說」頗有關連，我們不妨另製一個概念，也就是把他放入「神韻前史」來談。我已發表的〈神韻前史：陸時雍《詩鏡》的杜詩學批評與盛唐圖像〉（《政大中文學報》第 29 期），只是初步的嘗試。

二、「摹擬之作」：關於復古派的「摹擬」，一如前述，除了應當注意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其「摹擬之作」，值得投以更多的關懷。包括：就實際作品而言，「摹擬」如何呈現？具有什麼價值？這是這本書中較少碰觸的。我即將發表〈明代復古派詩學中的「摹擬」議題〉（《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94 期），或可稍補不足。

三、「古學漸興」：有關「古」的魅力問題，當然不限於明代復古派專屬，諸如《文心雕龍》如何結合「宗經」、「辨騷」而論學古？宋代江西詩派，亦曾被視為「剽竊之黠者」（王若虛《滄南詩話》評黃庭堅），如何學古？如何認取「古」的價值？這都是值得重新梳理的問題。

討論人觀察與對話

徐國能教授：

在座的各位師長、朋友，大家好！英傑的《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從某方面解答了我很多以前接觸文學批評史、閱讀詩人作品時，所產生的疑惑；但隨著其中體系開展，新的疑惑又由之而來——並不是英傑寫得不好，而是這本書啟發了我思考關於詩學根本的問題。

有次我突發奇想，將中國古典詩創作者與愛好者想像成一個宗教，《詩經》、《楚辭》為「舊約」，杜甫詩則為「新約」。守仁老師聽了，心裡一定覺得很好笑，我完全在講巴哈跟貝多芬在古典音樂鋼琴演奏史上第一個價值。既然是舊約和新約，「約」字代表訂下某種規模、典範，後人便會對此美學建構產生既焦慮又嚮往，同時充滿迷惑的樣態，即《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所談及的問題。我們都來得太晚，假設我比杜甫早一百年出生，搞不好是杜甫學我，不是我學杜甫，可惜他就是生得較早。因此，在後代的詩學脈絡下，由北宋的宋初三派便學唐詩；江西詩派則學杜詩；南宋所謂的江湖派，又是學晚唐詩；元朝人談詩法，仍是以杜甫為宗，其中最大家、最了不起的就是元好問，他有一個別稱就是「杜陵嫡派」。學古的歷程，已然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創作中最基本的範式。這便引發我無限的思考：我們做為一個創作者，為什麼一定要去追求古人典範去摹擬、學習，甚至淪於模仿、抄襲呢？過往說法認為這是學習必經之路，比如剛學毛筆，必須臨摹歐陽詢、王羲之、顏真卿之帖；那麼明代復古派的終極追求，究竟是什麼？明代詩壇是相對熱鬧的，理論如雨後春筍；可是若要說明代誰是真正的大詩人，能在文學史上星光熠熠？我認為是很難說的一件事，因為他們的獨創性太少了。

我不斷經由此書思問，復古派作為藝術創造者，他們為什麼自甘限於一個非常小的世界，然後在那世界裡做一些非常細微，乃至後人覺得無所謂的轉變？既不能改變中國古典詩歌的典範，也不能建構新

的詩學思想。復古派在藝術上追求的真正目標為何？何為他們詩歌的美學典範？我們再將杜詩喻為「新約」，後人閱讀、理解、詮釋這個作品，並因詮釋不同，而產生教派之爭。復古派對杜詩學的闡述，是否對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變化，或是杜甫在文學或詩歌史上的地位，具有突破性創造？我一面讀一面思考這些問題。本書非常有啟發性，是一本很好的著作。

我認為可由幾個層面來看「復古」和「摹擬」。假如復古是嚮往太上，摹擬則為表現手段，表裡二層的概念下，不論「古」是指詩、騷、漢魏、盛唐，或是李、杜，復古派已先將「古」設定為一種正面價值取向，並非客觀的實踐描述。換言之，「古」，基本上即是具有正向性的唯一美學術語。因此，呈現「古」的詩歌美學，便是復古傾向者的追求目標，其中他們好以摹擬的方式，去實踐古之美學。就我的認知，手法不外三種：

一、語言學：大量選擇古人或杜甫所使用的詞彙、符號，並藉由重複符號，造成相關聯想。

二、詩法：學習古人之句法，仿其構句方式。例如：明初袁凱〈得馬叟書作此遠寄〉詩：「童稚相看四十年」，出處為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童稚親情四十年」，簡直就像在幫杜甫照樣造句。杜甫近體和古體各有其獨創的章法，復古派的摹擬手段，便是重複其章法特色。

三、心態情感：指喜學杜甫的心態和情感，只不過明人身世與杜相去甚遠，遂惹得後人啼笑皆非。再以袁凱為例：他常嘆老悲窮，好似活在唐肅宗、唐代宗、吐蕃入侵的

時代；實則袁凱身處之時並非如此。

復古派極力以這些方向呈現自己類似於「古」的風味色彩，不過杜甫和明人的詩法之間，類似性多高？我們又有什麼證明認定復古派學杜甫？說不定是他們某天自己想到的。他們之間更緊密的關係，未輔以實際作品論證，其中互文產生復古的可能性，便留待未來思考深究。總言之，復古派的總體追求、復古派杜詩學對杜詩在中國詩學史上的影響，以及後代詩學所興起的追隨也好、反動也好，都是可以再延續的方面。

在第二章〈重編《海叟集》的意義〉（頁78）構思很好，但我想提出自己的看法：袁凱詩尚可參閱王夫之《薑齋詩話》中的意見。王氏的詩觀和格調派可謂光譜兩端；以宗教學而言，王氏可說是異端。大家都認為很了不起，王夫之卻覺得沒什麼的詩有兩首——袁凱〈白燕〉、高啟〈梅花〉。他挪用佛教語彙「現量」、「比量」、「非量」，以說明此二詩皆非「現量」，都是「比量」或「非量」。大家若有興趣可以去看蕭馳先生的文章，他對此有很深的討論。我認為此說法直接指出復古派存在的重要問題——「非現量」傳達復古派的詩作不是源發於自我心靈感動的內在，而是堆砌古人詞藻、意象、典故，乃至於古人的心靈活動去敷衍，作出一首看似非常有風韻的作品，卻也因此動搖復古派的美學理論。

復古派這種「非現量」，而是「比量」、「非量」的創作方式，在錢謙益的時代大放異彩，因為時代環境改變，他們反而必須借用復古派所建立的這套符碼系統，來

活動紀實

藏匿他們對政治、家國之思的隱諱心理狀態。或許復古派在實踐詩歌理想與創作中，沒有顯著成就，流傳至清代卻開展出不同姿態。清代的格調詩學，開出二途：一途以沈德潛為主，學得膚淺復古，追求詞彙、句法、章法；另一途將此轉化為語碼系統，以達更幽深的創作，可說是為中國古典詩的美學史作了修正。

許銘全教授：

廖老師、英傑，各位老師大家好！我對「杜詩」的相關議題很感興趣，在此分享一些想法和問題。

第一，閱讀完英傑這本書後，個人收穫良多。特別是其中的詩話家、詩論家都不陌生，經常在文學批評史或相關文獻中看到，卻都沒有安置於 16 至 17 世紀詩學變化的圖像。以往，或許曾以不同的詩學脈絡去理解復古派，但對於前人相互爭辯、承啟之間的關係，以及復古派所思所論的真義，卻仍梳理得不夠清晰。英傑這本書將復古派聚焦於杜詩學這方面，少見於前人，對我卻是知識上的收穫。

第二，書中的問題意識是：當他們內部自覺摹擬之弊，該如何救治？身為讀者，我其實沒有看到清楚回答。復古派若可理解杜詩正本清源的價值，遂可消解外部對他們的批評，惟此似乎有些間隙。借用國能老師的「新約」為例，創作者讀過新約，視其為典範，但他的創作未必能成為等量齊觀的作品。作品、觀念、詩法之間，是不是有落差尚須檢視？恐怕是這本著重在詩學觀念，較少作品詮釋的著作，難以呈現的部分。

第三，英傑利用一些書信和序言等材料，釐清並具體呈現復古派內部觀念、對話性、傳承性的知識體系；梳理明代不同時期的變化，回應外部挑戰質疑。這是對我最有收穫之處。不過，我比較看不出來的是：復古派以杜詩為典範，那跟他們詩論核心的關聯是什麼？亦即，若不只是談格調、章法，他們認為的「詩」是什麼？復古派內部的紛爭主因，是不是他們對於杜詩的想像或價值詮釋有別？換言之，他們可能各自對「詩」的本質想像不一，於是接連對杜詩產生各種理解。

我想提一個比較細的問題：法極無「跡」、「化」具體而言是什麼？王維楨尊「法」，囊括句法和章法，均是具體可行的分析方式。例：他以〈送路六侍御入朝〉為「倒插法」之例，後人便可積而學之。在王世貞的觀念中，王維楨之「法」卻過於生硬，等而下之。王世貞《藝苑卮言》談「法極無跡」時，雖然英傑已判斷哪些觀念術語是重要的，我們卻仍看不出「跡」的具體意涵，也無從由文本得知，這讓我感到些許距離感。至於胡應麟討論相似意義的「化」，就我理解，這是指在字法、句法、篇法的安排後，使閱讀效果不只有一層意涵，近似於白居易所謂的「二重義」。

另外還有幾個想法：

關於杜詩和杜甫以外之盛唐詩關係的問題，我發現胡應麟、何景明的觀念是不一樣的。杜甫既是盛唐，又可以獨立言之，我認為此關係到他們對杜甫和盛唐詩風理解走向——這個面向散落在各章的小節裡，我覺得很有意思。

此外，學詩好像是「工夫論」，不只是

單純的「學」而已。為什麼是先學杜甫，而不是先學盛唐諸家？我猜測是他們各自的架構不同所導致的現象。

再者，英傑這本書，探討復古派的詩論較多，而較少分析作品。其實兩者關係密切。如何從復古派的作品中，去看出他們堅持秉守的詩法，這是值得後續探討的。

廖棟樑教授補充：

銘全之所以有這樣的疑惑，可能關涉英傑先前一篇論文〈論明代「詩學盛唐」觀念的新異性——一個「理論實效」的思考脈絡〉（《漢學研究》第26卷第3期），所提及的「理論實效」。明朝人尊盛唐或學杜，當然不是他們首創的；但明朝人的特異性在什麼地方，可能就是這本書想要發揮的。因此，英傑認為這裡面的核心概念就是「理論實效」，即理論和創作之間要如何貼合。

銘全提出的問題，涉及我們對盛唐、唐代或尊唐的理解。有些人尊盛唐，可是不一定尊杜甫；有些人尊所謂中唐、晚唐、李賀等，隨此情形出現的「唐音」和「杜格」，明人已經開始關注兩者之區分。我剛剛由英傑提到的「妖魔」切入，去聯繫到明人曾以「魔宋」稱杜甫對宋代的影響。可見明人對宋人學杜的流弊，實有深刻反思。

曾守仁教授：

現場、線上參與的師友同學們大家好，個人很榮幸參與這場精讀會。本書以七章加上一篇附錄，相當沉重，是一本擲地有聲的論著。以其環繞杜詩為觀察中心的七章而言，第一、第七為緒論與結論，第四章討論了李攀龍、第六章也涉及到竟陵派，分別處理了幾位復古派的大家。有意思的是本

書名為「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並不在於求全責備，將前後七子全部包羅進來，而是採取杜詩為討論焦點，聯繫諸家的復古視角，從而挖掘出復古派對於詩學的主張，藉以廓清後人以摹擬簡單的概括「詩必盛唐」、「抄襲剽竊」的印象。

再者，這也是杜詩在明代詩學裡的接受研究，沈德潛說：「唐人選唐詩，多不及老杜」，足見老杜在當世詩名不顯，但是「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王安石語），經歷宋代之後，杜詩成為明人學詩不能避開的前輩、也是幽靈。

英傑討論復古派，而復古的問題涉及「學古」，學古的具體對象即是杜詩，也就是「學杜」，因此由此聚焦了討論的力度，也擴及杜詩學裡的「尊杜」、「攻杜」等的問題，一方面縮限、一方面是發散，在兩大向度的交會裡，逐漸展現出復古派的詩論面貌。

復古派、杜詩，說實在並不是新的問題，但英傑再介入這個論題，我認為他做足了準備，此題可以說是作者博士論文《宋元明詩學發展中的「盛唐」觀念析論》的深化與延伸，新書裡的杜詩學其與盛唐觀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再者，一方面英傑所徵引的材料與一般討論復古派的論文相較，更形完備，不管是從李、何重編袁凱集（第二章）、或是以錢謙益《列朝詩集》作為引子，辨析復古派既定印象；又如討論王世貞時運用盧坤的杜詩五色評點本、王維禎對杜詩的評論意見等等，主要還是有持續的思索，使得老議題裡因為新的關照、鉤連出新的材料，而顯得生機奕奕。

活動紀實

英傑按明人所謂分體、辨體的角度來安排、討論。我認為第二章很有意思，此章由一個提問開始。李、何作為前七子，在復古派中必有指標性意義，但聚焦於杜詩時，何景明好像都處於應和的角色。由此延伸，可見兩者對杜詩的不同認識與側重。

袁凱以學杜聞名，剛徐教授也提到王夫之在《薑齋詩話》批評袁凱，卻也在《明詩評選》中選袁凱詩，並談「現量」的問題。李、何與陸深重編袁凱《海叟集》，具有向其他學杜者申明「杜詩為何」的意義，從中亦凸顯李、何對杜詩的不同側重。李夢陽和何景明同樣主張師法杜甫以復古，何氏認定學杜要限定於歌行、近體，至於五古應師法漢魏，更細膩區隔自己與李夢陽之間的差異。

這章往下便處理李、何互相批駁的問題。由於是復古派大事，所以專節處理（頁90-110）。由此挖出復古派的根本問題：何景明強調「擬議以成其變化」，李夢陽認為自己是「為方圓，不能捨規矩」。雙方實有相同之處，因為何氏強調的「以成其變化」，和李氏所提到的「尺寸古法」卻「罔襲其辭」，都不是停留在形膚摹擬的弊病；但針對實際創作的詩歌，他們便會有不同意見。何景明批評李夢陽「間入於宋」，李夢陽不但批評「宋無詩」，他對杜詩中具有理致、理語的詩歌，也有清醒的認識，並不認為這等同於宋人的理趣詩。

接下來，英傑討論何景明〈明月篇並序〉，此處談得滿好的。此序中出現對杜詩的貶抑，英傑似乎放入與李夢陽之間的比較去思考。我們知道李氏〈缶音序〉：「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歌詠」，可跟何氏「調失

流轉」相互補充連結，並看出他們各自理論的重心。不過，〈明月篇並序〉言：「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又提到他是「陳事切實，布辭沉著」。我認為他的重心在「布辭沉著」，可是「陳事切實」和對於風詩的缺失，是否都著眼於杜詩的音樂性，批評杜詩只在修辭上用力。

由此進一步思考，李、何對於杜詩七言歌行的批評，所謂獨缺風義，會不會和杜甫的「詩史」相關，亦即「事」是否凌駕於「情」？藉由此書第二章具體而微的作法，突破今人對李、何的平面認識，使其詩學產生立體化的風貌。

總體而言，該書以人物分章，並將某些議題貫穿在整個復古派的論述，甚至可見時期前後的差異性。比方說銘全剛剛的提問，復古派整體而言，對詩本質的認識和要求為何？或是書中數人對詩的認取，如音樂性等，時至後期的許學夷是否產生變動？那都可由書中橫向的共時性見識差異，而不只是看到歷時性的發展。這是我覺得很有趣的議題。

回到英傑的關注點，復古派的摹擬為論者詬病，讓我聯想到胡適的「八不主義」，明言否定為「不模仿古人」，「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套語濫調」，其由亦為模仿，「言之有物」即不模仿古人的正面表述。換言之，其中有半數皆是抵制復古。胡適更稱摹擬只是添幾件「逼真贗鼎」，可見他多麼深惡痛絕，同時塑造後人對復古摹擬的認識。我邊讀邊想，回到傳統說法，古人常要說要有我、有個性，卻難以和機械的摹擬、抄襲連結。因此，我想「學古」是一個關鍵，正是因為創造總是從模仿開

活動紀實

始。若將此喻為學習傳統、理解過去的功課，隨著傳統積累愈多，它帶給後人的功課便更為沉重。這時的「學」不只有量的增加，他必須有一套化繁為簡、為道日損的工夫，必須脫卸、解縛，否則就不能去談復古。

更何況是整體中國詩學，或是中國文學的「崇古」傾向，無形中加重復古派的負擔。胡先驌〈評《嘗試集》〉說：「夫人之技能智力，從言語以至於哲學，凡為後天可得者，都必須經過若干時間的模仿，始得有所創造」，他已清楚說明：很多古人都作詩，唯有少數創作者可為後人取法，所以學習者必然要模仿，必須知其所以然，自己發語表物之方法與態度，方可與古人媲美。恰好他亦舉學杜為例，傳達「真我」所在——每個人學杜後，各個不同；脫胎於杜，即為創造。「學古」的問題遂不僅是量的積累，更來自於如何處理龐大詩學的遺產問題。

我發現英傑分析每一個重要的復古派論者的談法中，都涉及了這些議題。例如：謝榛主張「想頭別」或是入乎神化的「興」，實即救濟。王世貞云：「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并歸。」特別強調「離」、「合」之間存「悟」。英傑似乎避開我們熟知胡應麟的「體格聲調」和「興象風神」之說，不過前者有則可循，後者無方可執，「無方可執」正是對「有則可循」的超越和救濟。這些詩論中，不離「神」、「妙」、無可預想、辯證融合的因素，不過若看南宋姜夔，他便已具有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到自然高妙，即提升到超越的過程。因此，一方面是辯證融合，如書中所提，另一方面因詩歌語言本具天機靈動，由宋代起便強調從「識」，提升到「悟」，終能「化」，從「法極」到「無跡可循」的地步。

靈感來自於許學夷說：「予論盛唐律詩為破第三關，學者過此無疑，斯順流而下矣。」許學夷運用胡應麟《詩藪》的三關說。（不見於《詩藪》，顯然為許氏自行創造）第一關為「五古」，「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他認為讀謝詩可破第一關，即破「詩道陵夷而降」的問題。晉宋之交，是「詩運之轉關也」，這也是王夫之等學者在論述中特別重視元嘉詩壇的問題。

第二關為初唐四傑，「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所以藉由李、杜去破第二關。胡應麟對李、杜有相當多的討論，譬如說李、杜並舉，二人才氣、格調，古體、歌行，大致相類，但是「李偏工獨至者是絕句，杜窮極變化者是律詩」之中，始有辨體問題。「才超一代者，是李也，體兼一代者，是杜也。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則出現格調的味道。「超出唐人也不離唐人，是李也」的思維，即是格調論者救濟自己的方式，「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杜也」，便是明人對杜甫的認識。

第三關談七律的問題，胡應麟引杜甫〈登高〉說，子美的五言律和七言律，「風急天高」則是破第三關。他評這首詩：「古今七言律第一」，但「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亦可回應剛剛銘全所問。三關真正的根源來自明代對宋詩的超越。三關本源於佛教說法，指稱三個問題、三種話，其實都強調「悟」。

由此聯想，因為嚴羽的「別材」、「別趣」做為「起」，開端摹擬學習，不過終將要拋棄尺寸規矩，得到何景明「擬議以成

其變化」的變化。清代的三關說、真唐、真宋等，他們所背負的知識遺產更多，超越明代；但他們不像復古派只是在盛唐做活計。三關說可稱作逆溯而上的詩家公案，從元祐到元和到元嘉，從隱含入門、學習、逐漸積累，並且從中獲取個人心解，最後將情理合一。總言之，三關說終極境界並非靜態，而是持續不斷的思辯過程。

由此可照見許學夷、胡應麟詩論的特殊之處：

一、胡應麟的說法顯見明人學詩以盛唐、漢魏為規範，李、杜的互有勝場反而是對於「取法乎上」的強調。學杜甫近體詩，反映見識的培養和明人的事實觀念，所以可從體格、變體更細膩擴充審美風格。

二、許學夷呼應胡應麟的三關說，顯見復古派清楚讓「悟」的層面顯題化；王世貞從「法極」到「無跡」的效力可再評估。

三、復古派和言語的關係，可由「學」到「悟」的角度討論。

四、李、何到胡應麟、許學夷讓自我超脫、救濟的境界顯出，但在工夫的論述左支右絀，以致於普遍印象為「擬議」，而不是「變化」。工夫和境界該如何相互交融合一，始終是個問題，是以造就後人、或他們自己亦察覺的摹擬陰影。

謝榛的杜詩學中，英傑本來揭出「興會」和「苦吟」如何相容而不悖的問題，這是別具辯證意味的說法。杜詩的造語價值，必須由「興」來做基礎，它不是浮泛的文字技藝，苦思在這裡發揮了相當的作用。英傑在此略微輕輕滑過，因「苦吟」和「興會」本是兩種不同態度，試圖融合的同時，便放

過謝榛無法彌合之處。所謂「不黏不拖、不即不離」，正是後人要解決復古派所留下的詩學公案。

最後，回應國能教授提到的問題。我們在學音樂的時候，其實我們學的每首曲子都是別人已經創作好的。每首的譜、上面的記號、大小聲都寫得清清楚楚；可是當每一個演奏者演奏之後，那首曲子都像第一次誕生。這部分是不是可以回應復古派的一些問題，我沒有很好的答案，這只是一些想法，謝謝！

廖棟樑教授：

首先是明代和擬作的意義。從李夢陽到許學夷的系譜，便可見本書欲談整個時代的文學意識典範。明、清從前後七子以來建構的文學典範，引發「要不要學習」及「如何學習」前人作品等議題。由此角度切入，英傑談典範意識的建立，當然不是要膜拜經典文學作品，而是凸顯其如何作為後人學習的榜樣。工夫論，即創作的規律和方法的關注，遂由此出，同時這也是所謂「詩法」以及本書的問題主線。

由創作規律和作品特徵開展的研究，李夢陽曰：「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然後他特別提到：「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李氏將文法視為「物之自則」，如此自然，便意味他所談的格調、頓挫、倒插等，都不僅僅是一種古典藝術形式，而更屬於內在精神的本能問題。因此，其觸及範圍不再是文學的修辭技巧，而涉及美學問題。

我們漸漸看到明代「格」、「意」、「趣」

活動紀實

的出現。由「趣」會聯想到嚴滄浪的「興趣」，又或是公安派的「趣」。當然他們各有依傍，但不管從明初的高啟、明中葉的謝榛，「體」、「志」、「氣」、「韻」等術語不斷浮現，顯然在學的過程中，他們已逐漸往「悟」、「境界」之必然邁進。另一方面，明代相對其他時代提出更多宏觀的、抽象的術語，一些特定術語都在此時被拈出討論。

若此為自然發展，法式的研究學習便難以解決「趣」之問題，而須由「悟」方可掌握。雖宋代早已討論古法之法，但由「法」到「悟」的推衍，顯示出不能僅仰賴學習、把握杜詩或其他古典作品，更要關聯個人靈感與悟性。在此情況下，一方面出現具系統性、理論性的法式；另一方面具個人生命色彩的感悟亦逐漸顯現，遂可見近似唐宋派、竟陵派的「本色」和真精神的追求。本色和追求真精神若抵達極端，便會強調主觀體驗，再跨一步，只得落至「空疏」情形。

對文學的古典意識的建構，帶出復古運動的標誌與特色；但這種對「法」的重視的內在性，卻又蘊含了「反復古」的一面。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提到古史辨興起來自對歷史特語的強調，那麼反復古和復古主義實源於同一個內在性。建構的同時，解構已然存在。

英傑不斷辯證思考「法」和「悟」兩者如何相互結合，或是分論彼此之間的關係、各自的價值，這都是明代新異性的特點。不過，從某種理路而言，所謂「古法」和「悟」皆是由「法」逼顯出來。我們便可探討宋代道與法、明代法與悟之間的異同，各自更帶出什麼樣的問題。

李夢陽提出物的「自則」，逐漸寓示古

典作品精神所啟發的內省經驗，和「真精神」、「真本色」等術語。此同樣出現在唐順之、公安派等，對前後七子推崇的古典價值、古典主義意識的反撥。這種反撥表面上看似二元對立、截然分別，不過個人自發的真趣，其實並非與古典主義背道而馳，兩者之間隱約有著內在理路的關係。就某一方面而言，有意的反撥導致另一個極端；但我們今天、或是英傑的書裡，反撥背後都不是二元對立，而是端看從哪部分著眼。包括袁宏道等人，其文章不見得完全反對古典主義，甚至可以說他們是為了和古人一樣，不依傍前人，所以特別提到「莊子詆毀孔子」等道理。總言之，整個明代文學論爭，從某一層面觀之，其實是籠罩在復古運動之下。

李夢陽一面談復古，一面談格調時，又特別傳達重視「真情」，其中矛盾是否油然而生？書中針對這部分有些討論。所謂「刻意古範」到「情以發之」，這兩者間的關係該是什麼樣的情形？另一方面，學古和對人品道德的強烈要求關聯甚鉅，如前七子高標氣節、敢放言抗爭的印象，乃至張揚個人主義的精神，其中很有意思之處，便是自我個性的揚放，原來是從復古出發。這是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綜合討論

陳英傑教授：

謝謝各位老師精彩的論見。

國能老師和銘全老師都表示對作品的重視，特別是國能老師針對作品出發，析論摹擬三層次。這的確是我在本書沒有花許多篇幅去分析的部分。

回應銘全老師的另一個問題。我在寫作時，亦有類似的疑惑，可是我的解答，反而是跟守仁老師類近的。復古派後期的詩論趨於細膩化，但他們好像終究沒有確切提出救治摹擬的「方法」，說來說去都是對杜詩特質的描述。此時，我會設想自己為當時的「創作者」，以瞭解復古派救治摹擬之弊的方法。我發現他們的解決方法，實非列出逐條清晰的步驟，而是指出原則性的大方向，所以銘全老師的推測正是我的想法。當我們對杜詩特質，或詩的價值立出標竿時，我們便有前進的方向，或許能更容易擺脫摹擬。

守仁老師提到的救濟問題，例如謝榛談「興」是否具有救治摹擬的意義？我認為有的，不論是「想頭別」，還是守仁老師提到的「無方可執」，並帶出「悟」，都是他們的克服摹擬的方法，亦非條列式的方法。任誰都知道「興」，卻非人人可實踐，是以到了胡應麟、許學夷的復古派後期，他們不斷談「悟」，亦是一種救濟。此前提為：須先學典範詩作的體格聲調，「積習之久，矜持盡化」，遂能開顯「超邁」的「興象風神」。不過「習」和「化」之間的那個逗號，需花多久時間？恐怕也沒有定論。另一方面，那些不能「悟」的人，在他人看來便只是在仿

古。

我有個感想：當我們研究看似不合時宜的復古派，好像跟今天的距離好遠，可是如果就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具有一個重要意義：復古派如何成為我們進一步瞭解王夫之，或是清代詩學的相關論辯的對照座標的一個基礎。

黃偉豪教授提問：

各位老師，此書中有許多精彩論述，拜讀過後很有收穫。本書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復古派，一個是杜詩學。按「復古」似乎可細分為創作上的復古、文學批評創作論上的復古，以及文學批評批評論上的復古，而四庫館臣在《空同集》提要指向的似乎是創作上的復古，而胡應麟和許學夷反而像是文學批評上的復古而非創作上的復古。那末，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理解明代「復古派」時，應該是從創作、文學批評創作論，還是文學批評批評論來理解會比較恰當？

陳英傑教授：

我們在談明代復古派詩學的時候，可以留意「復古」在明代是相當流行的觀念。不只是復古派、格調派、前後七子及其追隨者，從明初到明末這個範圍裡，許多被視作不同流派的人都談復古、尊古。

本書和一般狀況將復古派界定為前後七子，其實是要強調他們不只和大家一樣學古，更重視「第一義」。剛剛您所提到復古跟何種面向有關？我想其中涵蓋了許多層次，而這正是我們梳理古典文獻時必須辨明的。我想借您的話補充：關於創作層次上的復古，當復古派聲稱學盛唐

活動紀實

等，很多時候仍可發現不盡如此的細節，例如李夢陽學謝靈運詩。

許建業教授提問：

各位老師好，整場內容對我有很大的啟發。若將胡震亨放到系譜中，會有什麼樣的情形？另外，此書似乎沒有注意到趙宦光的《彈雅》。這是最近挖出的材料，胡氏、趙氏二人和許學夷時代相當，可作為對照。

陳英傑教授：

胡震亨確實是重要的研究對象，全書結論曾簡略提及，細節有待未來續作探討。

《彈雅》是值得注意的材料，謝謝！

張豔同學提問：

各位老師好。徐老師剛剛所談「非現量而是比量」，能否再請進一步說明？

徐國能教授：

我以「非現量」引申到清代王士禛談神韻派，腦中浮現的是〈秋柳〉詩四章。詩章中的創作概念和寫作格式，和高啟〈梅花〉、袁凱〈白燕〉非常類似。裡面使用大量傳統樂府民歌，描繪秋遊情景去鋪陳篇章，就王夫之的觀點可能是「非現量」的。但這首詩能夠成功，正也是因為在典故和不確定性的意象當中，不直抒己意，傳達某種深不可測的思維，或是引發讀者在語碼系統中聯想。最終造成解讀有別，產生不同想像。嚴志雄老師好像有專門出一本書討論這個問題。

總結

廖棟樑教授：

顏崑陽老師《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前陣子出版，今天這場精讀會剛好可以呼應他的著作內容，陳英傑這本書正是力行學術突圍。

「傳統」是復古派完全繞不過去的東西，如同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具〉所說，傳統與個人才具之間相互辯證，或是誠如賀拉斯（Horatius）所說：「古典主義的東西本身就具有合理合適或者借鑒等各種原則。」在此情況下，英傑這本書籍由多個面向，逐漸拓深復古議題。

最後，謝謝各位在炎熱的天氣，一齊討論看似古老遙遠的東西，但這裡面卻似乎總有一種安身立命的價值、志業在其中。





活動紀實

「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簡介

◎傅朗 (Nicolai Volland)

傅朗 (Nicolai Volland)，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會長，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碩士、博士畢業，曾經為台灣中央研究院博士後學員、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現任賓州州立大學亞洲系、比較文學系副教授、研究生計劃主任。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及其世界脈絡、世界主義、翻譯研究等。著作包括《社會主義世界主義：1945—1965 年的中國文學世界》(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 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 1945-1965)。

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簡稱 ACCL) 成立於 1980 年代，代表全球研究中國/華文文學的學者，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是目前世界規模最大，且是唯一雙語性質的中國/華文文學組織，會員來自北美、歐洲、東亞等地區，宗旨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培養學術界的下一代、展開多元研究視野、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歡迎跨國性與比較性的研究，涵蓋古典與現代文學，容納各種學術方法與視野。

ACCL 起源於 1980 年代，當時在美國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研究生經常遇到學科方面的衝突與疑惑。因為研究生的博士委

員會成員一般來自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系，而這兩個系的學術傳承與視野相差較大，導致學生經歷不少困惑。1980 年代中期，不同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開始跨校聯繫、討論共同面對的困境——實際上便是做為學科的中國文學研究之困境。這乃是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之初始。

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於北京；1987 年第一任會長樂黛雲帶領中國代表團到美國參加第二次中美比較文學座談會，同當時任教於印第安納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的歐陽楨 (Eugene Eoyang) 商量，決定建立的旅美學者分會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即 ACCL 的前身。旅美學者分會就成立於印第安納大學，歐陽楨指定其學生陳小眉，樂黛雲指定其北大學生吳北玲 (當時在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唸博士) 做為分會的負責人，並指定剛從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畢業的趙毅衡 (Henry Y. Zhao) 為第一任分會會長，吳北玲為副會長。趙毅衡不久前往英國，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因此辭掉會長一職，由陳小眉擔任第二任會長。

早期會員大多為博士研究生或畢業不久的青年學者。學會此時的活動較有限，沒有召開學術會議。不過，吳北玲在芝加哥自家辦理小型出版社加印刷廠，自費創辦《中國比較文學家》The Chinese

Comparatist，成為分會的會刊，屬於北美洲最早的以中國為主體的比較文學學術刊物。《中國比較文學家》本為季刊，隨著吳北玲的英年早逝，出版三期後停刊。

1988 年下半年，會長陳小眉找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李歐梵教授商量旅美學者分會的活動情況，李歐梵答應第二年春季邀請部分分會的研究生與近期畢業生來芝加哥，用分會的名義辦一次座談會。此次座談並非正式的學術會議，與會者沒有發表論文。前往芝加哥的會員包括陳小眉、劉康、唐小兵等，討論北美的中國文學研究之現狀與趨勢，並舉辦第一次分會會長選舉，當選者為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劉康。沒想到座談會正好遇到六四天安門大屠殺，與會者在座談之餘看電視報導，並上街遊行抗議。

座談會提出要辦一次正式研討會，由新任會長負責聯絡。劉康 1990 夏季在紐約長島擔任訪問學者，聽說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教授在不遠的康乃狄克州度假，因此發信並開車前往。一次長談後，詹明信答應該年秋天在杜克大學開一次中國文學研討會，亦即旅美學者分會第一次正式會議。會議主題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規模頗大，與會者四十左右，跨越不同學派與背景，包括李歐梵、林培瑞（Perry Link）、耿德華（Edward Gunn）、阿里夫 德里克（Arif Dirlik）等資深學者，還有如胡志德（Ted Hutters）、張隆溪、劉康、黃子平、王德威、張誦聖、劉禾、張英進、鄧騰克（Kirk Denton）、王斑、奚密、張旭東、魯曉鵬、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等青年學者。還有流亡海外的中國學者和作家，如劉再復、李陀等，也參與杜克大學

的此次會議。與會者投票選出魯曉鵬為下一任會長，並且決定改名為北美中國及比較文學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從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獨立出來，不再做為分會。

會議的部分論文隨後編成論文集，1993 年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現代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學論述》（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包含十二篇論文，詹明信做序，李歐梵寫後記，除汪悅進（Eugene Wang）之外，其他論文都是與會者之著作。該論文集應是美國最早匯集的中國文學新研究成果，由重要的大學出版社發行，在當時的學術界頗具影響力。

1990 年代，ACCL 的年會改為雙年會，同歐美多所大學合作，如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1992 年，李歐梵已從芝加哥搬到洛杉磯加大，協助舉辦此次會議）、普林斯頓大學、喬治亞大學、維也納大學等。1999 年在維也納與薩爾茨堡的會議，是第一次在美國以外的地點開會，時任會長為張誦聖，維也納大學的李夏德（Richard Trappl）教授協辦。此外，學會還借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之年會辦過三次小型會議，加強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之間的跨學科交流與對話。

2001 年雙年會於復旦大學召開，會長為奚密，乃是學會第一次前往東亞地區開會，得到復旦中文系系主任陳思和的大力協助。此會後，學會的名稱正式改為「華

專題企畫

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將「美國」一詞刪掉，代表學會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全世界學者的學術交流平臺，同時更加面向中國與東亞地區，作為英文學術界與中文學術界之間的橋梁。隨後的幾次雙年會，除了2003年倫敦亞非學院的會議之外，都在中國幾所知名大學召開，如南京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學會的首任會長趙毅衡從亞非學院退休後搬到成都，協助舉辦此次會議)等。

二十一世紀以來，ACCL 的發展主要有三個方向。其一，會議規模與學會的會員數量快速膨脹，雙年會從三四十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以上的與會者，也顯示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研究在歐美的迅速發展。其二，古典與現代並重，歷任會長的選舉和雙年會的論文都反映了很大的歷史跨度，並不限於現代文學。其三，學會內在與外在的多元化。2012年的雙年會第一次在台灣召開，合作單位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17年的雙年會第一次在香港舉辦，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此時，李歐梵教授已從美國搬到香港中大，又一次協助主辦雙年會)。除了會員來自更多不同地區和院校，雙年會論文也呈現出學術界對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的關注。



以上為2017年雙年會照片

「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迎向未來，將會促進各國各地學術界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支持新的研究取向和領域，注重下一代學者的培養，主張學術研究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希望大家一起為中國/華文文學研究的全球發展與繁榮攜手努力。

◎感謝劉康教授接受筆者的視頻訪談，講述學會創辦的來龍去脈及1990年第一次雙年會之背景，也感謝奚密教授、陳小眉教授、魯曉鵬教授、陸敬思教授提供諮詢與補充。



英國漢學的現狀與發展（2010-2020）

——以大學（學院）中的研究機構為例

◎張夢雲

張夢雲，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現就讀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博士班。

以研究者為分期依據，16 世紀前後是歐洲漢學發展中「遊記漢學」與「傳教士漢學」兩個時期的分界點；到了 1814 年，法國開設歐洲第一個「漢學講座」，即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在法蘭西學院主持「漢文与韃靼文、滿文語言文學講座」（法文名稱為「L 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開啟了漢學（Sinology）作為專業學科在西方的正式確立。

在「專業漢學」的誕生與早期發展中——1825 年倫敦東方語言學校（London Oriental Institution）成立、1837 年敦倫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設立漢學教席，英國較落後於同時代的法國與德國¹，卻是英語國家漢學的肇始者。尤其是 20 世紀後，學院制的擴充與研究手段的精密化孕育了如翟林奈（Lionel Giles, 1875-1958）、阿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8-1966）、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1956）、杜德橋（Glen Dudbridge, 1938-2017）等漢學鴻儒。²

曾之為北美漢學在方法、架構上的被

借鑒者，英國漢學到了 20 世紀中期，在實用主義為要的綜合研究主導中，白之（Cyril Birch, 1925-）、韓南（Patrick Dewes Hannan, 1927-）等漢學家轉而赴美教學、研究。這種在知識領域對中國文學相關研究的輕視，被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稱作「奇異的漠視」（Singular Listlessness），在 20 世紀末雖然曾引起反思³，在一些學者看來，時至今日仍較為普遍。

例如，藏有近 600 種中文寫本文獻（以史部最多、子部次之）的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除了繪畫類文獻如仇英繪、文徵明書的〈女孝經圖一卷〉等受到關注，館藏的宗教類文獻、語言類文獻（尤其是如客語、閩南語寫本）、地理類文獻等⁴，都還待整理、探究；從英國漢學學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的會刊來看，對現當代中國（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社會、性別與政治層面的關注仍是主流，有關中古史、古代史（在英國大多被歸為 Pre-modern）相關的研究則相對較少⁵，這種情形於將亞洲人文藝術作為關注重點的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⁶則略顯不同。

然而大學院校中的研究機構——英

國「專業漢學」建設與教育最重要的障地，自設立漢學學科至今，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了海外漢學裡實用主義甚至是功利主義的傾向。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概述英國漢學現今在學院中的發展，並在已為人熟知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英國唯一一所專門研究亞洲、非洲、近東和中東地區相關的教育機構之外⁷，著重介紹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和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一、從「Sinology」到「Chinese Studies」

20 世紀英國在大學內設立並建設漢學或東方學教授講席，離不開三份重要的報告：提議在大學內增加漢學教授和研究職位並為他們提供資助的 1947 年斯卡布勒報告（Scarborough Report）、影響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成立現代中國研究所（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的 1961 年海特報告（Hayter Report）與建議將漢語、阿拉伯語和日語都列為 A 類語言、增加漢學類研究學生名額等的 1986 年帕克報告（Parker Report）。⁸

在這一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更因應社會科學的「Chinese Studies」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學派」所開啟的新範式，在英國的學術機構中漸漸取代了以文獻為基礎的、歐洲傳統特色的「Sinology」⁹，這在查詢全英大學院校內研究項目、學位的「Prospects」網站中便可見一斑。¹⁰

與之相符的是，大多數設有「Chinese Studies」的大學，從課程規劃與研究方向來看，都更注重醫療、政治、社會、經濟等類

似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方式，比如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對現代文化、媒體（Modern period in cultural·Media）的強調；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謝菲爾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對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等領域的重視。

顯然，字面意義上的「Chinese Studies」，在英國已漸漸不能和「專業漢學」畫上等號，但也有一些例外。像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Chinese Studies」項目，由羅維前（Vivienne Lo）主持的中國醫療、醫藥史（尤其是漢代）研究，便積累了古代文獻考證的傳統；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除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由 Christopher N. Payne 所授課的「Sinosphere」，即更廣泛意義中的漢學，是曼大漢學在教學上有別於其它院校的關懷層面；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的漢學學位（碩、博士）設在語言、文化與社會學院（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中，尤為特別的是學校還成立了利茲大學當代華語文學研究中心（The Leeds Centre for New Chinese Writing），不僅提供中文寫作課程，這下設一個類似讀書會（研討會）的組織，在學期內的每月，都會介紹、導讀一位作家的幾部作品，比如 2017 年 6 月與 7 月的韓麗珠、2018 年 6 月的董啟章、2017 年 9 月的畢飛宇等¹¹。

承前所述，英國的「Chinese Studies」

在教學中主要還是以有關中國的「通識」（包含中文寫作與口語）為模式，而對中國文學、文化與歷史方面的深入研究，多分佈在其它專業科系內，如比較文學系、歷史系、考古系、藝術史系等。¹²

二、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在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Chinese Studies」（含大學部、碩、博士學位）的授課及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現代文化（Modern Chinese culture）¹³、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學（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¹⁴、中國媒體與電影（Chinese Media and Film）、現代中國政治（Modern Chinese Politics）¹⁵、古代哲學與宗教（Ancient Philosophy and Religion）。教學以外，愛大的孔子學院（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Scotland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也通過定期舉辦講演或中國傳統節慶活動成為更貼近生活的漢學場域¹⁶。

（一）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

不同於前文提及的院校，愛大漢學不僅有古典文學課程，在中國古代研究尤其是思想史領域亦有所專長，這得益於從2006年開始任教於此的耿幽靜（Joachim Gentz）。

畢業於海德堡大學的耿幽靜，1995年的碩士論文 *The Chunqiu exegesis of the first 17 chapters of the Chunqiu fanlu* 與199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 *The Chunqiu exegesis of the Gongyang zhuan from its beginnings to Dong Zhongshu* 都是有關《春秋公羊傳》的研究。另外，他也以英文與德文發表了多篇關於

上古秦漢思想史、中國經典詮釋及古代禮儀、宗教的論文。近年來他研究項目，*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controlled divinatory cracks in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from the 13th and 12th century BCE* hel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對象是蘇格蘭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商代甲骨文碎片，他將漢學與法醫人類學相結合，探究甲骨用來占卜時產生的裂痕的過程。

（二）Chinese films

電影研究是當前愛大漢學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除了可供師生觀看的線上影片，愛大圖書館內還有超過600部20世紀的華語電影提供借閱。另外，在過去兩年的學期週，「Chinese Studies」都會在週五固定組織華語片的公開放映，早期國產片如張石川的《勞工的愛情》（*Labourer's Love* 1922）、吳永剛的《女神》（*Godness*，1935）、袁牧之的《馬路天使》（*Street Angel*，1937）、費穆的《小城之春》（*Spring in a Small Town*，1948）、當代電影如張藝謀的《紅高粱》（*Red Sorghum*，1988）、謝飛的《本命年》（*Black Snow*，1990）、王家衛的《花樣年華》（*In the Mood for Love*，2000）、賈樟柯的《三峽好人》（*Still Life*，2006）等都名列片單。

值得一提的是，當代華語電影作為再現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媒介，在英國大學院校的漢學相關課程與研究中已是普遍且相對熱門的議題，但愛大「Chinese Studies」在此之外還將上世紀早期的中國電影納入介述，使得華語電影的研究不僅具有之為載體的實用性，更體現出其作為

獨立學科的歷史特質，這離不開任教於此的費南山 (Natascha Gentz)、Julian Ward 及黃雪蕾 (Xuelei Huang) 三位學者的貢獻。

費南山 (Natascha Gentz)，畢業於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曾在北京、上海、東京等地訪學，專長領域為跨文化、中國戲劇與媒介 (主要是 20 世紀)，曾翻譯高行健的作品及其研究；2000 年前後的專書及論文聚焦於中國的革命戲劇與殖民帝國時期的媒體史。近年來，除了持續晚清以降的媒體、新聞研究 (「Translating Modern Media Concepts in Late Qing China」, 「The Invention of News in Late Qing Newspapers」, 「Networks of Communication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她對漢學在英國如何開展及孔子學院可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頗為用心 (「The Necessity for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 and Establish New Think Tanks」, 「The Role and Percep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K」, 「Sinology as Regional or Global Area Studies – Taking the BRI as Case Study」)，為此規劃了各種與中國文化相關的活動，例如戲劇表演、作家演講或是電影節等。

Julian Ward，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的「Chinese Studies」，1998 年成為講師時從事的是徐霞客 (1587-1641) 遊記的研究。此後，他在大學部講授唐宋詩、明清白話小說等中國古典文學的課程。2004 年，他以姜文的《鬼子來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 2000) 為文本開啟了對中國電影的關注，至今，他探討過的文本涵括《馬路天使》, 《早春二月》(Early Spring in February, 1963)、《芙蓉鎮》(Hibiscus Town, 1986)，以及「八

一電影製片廠」在上世紀 80 年代完成的三部較少受到學界關注的影片：《彩色的夜》(The Colourful Night, 1982)、《最後一個軍禮》(The Last Military Salute, 1982)、《戰地之星》(Star of the Battleground, 1983)¹⁷。

黃雪蕾 (Xuelei Huang)，於海德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在關注印刷技術與翻譯在 20 世紀社會與文化中的角色的同時，她從 1913 年由上海新民公司出品的影片《難夫難妻》開始，著手中國早期電影的研究，2014 年出版的專書《上海的電影攝製：跨境、連結世界，1922-1938》(Shanghai Filmmaking: Crossing Borders, Connecting to the Globe, 1922 - 1938)¹⁸ 以明星電影公司為例，探討上海電影的生產與發行如何參與全球文化的跨境交流，並以此說明流行文化在中國現代化轉型中的作用。近來，她的研究還從視覺文化延展至了感官尤其是中國的嗅覺歷史、文化。¹⁹

三、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的講席設立於 1876 年，而今漢學教學 (包含大學部) 與學術中心 (碩博士學位) 主要在東方研究所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部分專業研究則由考古所與藝術史所完成，例如考古所專長於青銅器物件分析的傑西卡·羅森 (Dame Jessica Rawson)，近年來便致力於培養學生研究從新石器時代至漢末的玉器、墓葬等議題。²⁰

在英國漢學發展過程中，牛津歷任的漢學講座講授都是其專業領域中的領導者與推動者，像是首任教授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 1861 年起的二十多年將《四書》、《五經》等 28 卷中國典籍譯為英文;戴維·霍克斯(David Hawkes, 1923-2009)在完成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翻譯(英譯的第一部全本)之外,還鑽研楚辭、杜詩;師從張心滄(H.C.Chang, 1923-2004)的杜德橋,博士論文聚焦於《西遊記》的源流考辯,之後至通俗小說與民間宗教文化的研究。這些學者也奠定了牛津漢學重視閱讀翻譯、強調經典文獻的傳統。

除此之外,被錢鐘書稱作「飽蠹樓」的牛津大學波德利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於 1602 年創立,兩年後收錄首批中文文籍(之後大多收入東方部),迄今為止,館藏的民俗寶卷、藏滿文文獻、明清商業圖書(有關海洋經濟史)等都是漢學家伏案參考、研究的珍貴文本;2008 年成立的中國中心(China Centre),匯集經濟、法律、人文、科技等各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者,儘管是類似以西方為中心的區域研究組織,但也提供了漢學在跨學科交流上的平台。

(一) 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

就廣義的古代中國研究而言,牛津大學當屬佔據英國目前在該領域的研究者中最多的一所學校。

考古所的 Anke Hein, 過去曾從事東亞和中亞地區史前和原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探究,近來她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國邊疆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文化的交流與人口的遷移。

在藝術史研究所,則有中國物質文明史的重要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他曾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先後於劍橋大學與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完成學位。專長於中國元明時期的藝術兼及現當代藝術、藝術史的方法論與史學,近來的研究興趣主要在於明代世襲貴族(宗藩)的文化、中國書畫及其觀眾。在最近的著作《中國畫及其觀眾》(*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²¹中,他介紹了觀看者、消費者(受眾研究)的不同身份及他們在中國繪畫形成與邊界上扮演的角色。另外是 Shelagh Vainker, 擅長於對北宋的物質文化、陶瓷工業及其環境影響,尤其是其作為闡明官員、商人、作家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的媒介作用之探究。她目前除了繼續宋代瓷器研究,也正在完成策劃中國當代藝術展覽的計劃書。

在東方所,古典文學領域主要由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的陳韞沅(Tian Yuan Tan)主持。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著作《自適與超脫:十六世紀華北的卸職官員與文人》(*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²²,由康海、王九思和李開先為個案,探究被貶官員如何使用如散曲等受到污名化的體裁來追求獨特的聲音與認同,以此區分他們與中國傳統精英。進入牛津大學後,他授課及研究的領域主要是中國戲曲與古典小說,近期的學術項目包含了整理、標點在臺灣新發現的 16 世紀的散曲收藏、文人劇作家在清代宮廷戲中的作用以及跨文化語境中的湯顯祖研究。

小學、經學方面:Dirk Meyer, 曾在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學習,後前往海德堡大學,2008 年於萊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他的第一本專書《竹上之思：早期中國的文本與意義生成》（*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²³ 論述了戰國時期文字的物質條件與手稿文化、哲學之間的關係。作為牛津大學手稿和文本文化中心（CMTC）的主任，他目前的研究計劃主要基於語料庫的概念史，探究「書」傳統在戰國時期對於社會、政治及哲學話語、思考上的形塑；目前致力於牛津圖書館現有編目的中國藏品整理、研究的 David Helliwell，曾專攻《永樂大典》版本文獻方面的問題。

另外，還有專長於儒學文化史、禮學、宗教信仰史、政治與軍事史的晁時傑（Robert L. Chard）與目前從事十八世紀中國地區史（尤其是山西省）、民族主義、民間宗教（天主教）研究的 Henrietta Harrison。

（二）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牛津大學對於現代中國的研究，興起於上世紀 80 年代後期，1982 年在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成立的現代中國研究所，在 1994 年合併入邵逸夫提議捐資建立的中國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近年退休的劉陶陶（TaoTao Liu），專長在民國時期文學中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且尤其對婚姻愛情的主題有所發揮。

Margaret Hillenbrand 是現在牛津漢學中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化研究的主力，此前她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任教。學術領域以文學及視覺文化研究為主，地域涵括兩岸三地、日本。在第一本論著《文

學、現代性與反抗實踐：日本和台灣小說，1960-1990》（*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the Practice of Resistanc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Fiction, 1960-1990*）²⁴ 裡，她分析了包括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等臺灣作家及吉本芭娜娜、野坂昭如等的作品，討論了文本內部表現出來作家對現代性及其影響中的社會的不滿以及懷舊心緒。近年來，她的研究對象及關懷，擴大至照片、電影及其所具有的反應社會及歷史的效用，她今年 3 月出版的專書《負面曝光：當代中國的知其不知》（*Negative Exposures: Knowing What Not to Know in Contemporary China*）²⁵，便是以影像為媒介，呈現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如南京大屠殺等的重大事件，並進一步探討當下人們對此的緘默的默契，即一種公開的保密文化（a culture of public secrecy）。不過，從她目前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選題來看，20 世紀中期的電影、當代華語語系文學、城市文化等，顯然也是她所關懷的議題。

四、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劍橋大學的漢學教學以亞洲和中東研究所（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為主，其前身東方研究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於 1888 年設置首任漢學教授職位（由威妥瑪擔任）。早期歷任漢學教授的著述成果，包括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的《語言自邇集》（*Yu-yen Tzu-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慕阿德（Moule, Arthur Christopher 1873-1957）的

《1550年之前中國的基督教徒》(*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蒲立本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2013) 的《中國史與世界史》(*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 的《唐代的官方史文書》(*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等都在漢學界影響深遠。另外，從這些論著也能看出，劍橋起初的漢學特色與重點在於中國語言與歷史 (尤其是唐代史)。²⁶

近年來，東亞研究系下的「Chinese Studies」已經拓展至語言、歷史及文化三個方面，在古代中國的基礎上，也更趨向現代中國的綜合研究。這種轉型也反映所開設的課程上：當代中國社會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全球化在中國，1850 至今 (Globalisation in China, 1850 to the present)、東亞電影 (Cinema East)、中國現代文學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 (China in a Global WWII)、東亞地區 (The East Asian Region)、現代漢語翻譯與寫作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writing)、現代漢語 (Modern Chinese texts)、中國文學 (Literary Chinese)²⁷、中國歷代史 (History of dynastic China)、早期到晚清中國：敦煌和絲綢之路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Dunhuang and the Silk Road)。

教學之餘，劍橋大學的圖書館也是漢學的研究重地，從 1623 年納入館藏的第一本中文書籍起，目前已存有逾 50 萬冊的中文藏書及藏品，包括由金璋 (Lionel Charles Hopkins, 1854-1952) 在 1952 年捐贈的超過 800 件的甲骨文與 20 世紀以來陸續購買、受贈的敦煌寫本的微捲、銘文拓本等中

文古籍資料，以及近代政府檔案文件 (多是二戰前後)、現代中文期刊、電子書、碩博士論文等。

(一) 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

劍橋大學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具有相當傳統，如歐美漢簡研究的先行者魯惟一 (Michael Loewe, 1922-) 與戰國至秦漢政治社會史家陸威儀 (Mark Edward Lewis, 1954-)，都曾先後執教於東方研究系。儘管陸威儀於 2002 年轉往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任教，此後他的研究也基本不屬英國漢學體系內，但同一年，他的學生胡思德 (Roel Sterckx FBA) 回到劍橋講授戰國、秦漢的觀念史與文化史直到現在，因此可以說，劍橋大學在延續其傳統的基礎上，仍為英國漢學特別是在文字學、歷史與思想領域上的引領者。

胡思德，碩士畢業後曾在國立臺灣大學進修中國古典文學與哲學，返英進入劍橋大學攻讀博士，於 1997 年完成學位。2002 年，他的第一本專書《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²⁸ 通過對戰國兩漢文獻的考察，探究古代中國關於動物的觀念及其對人類對我認識產生的影響；2011 年，他在《早期中國的食物、祭祀與聖賢》(*Food, Sacrifice, 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²⁹ 中考察中國早期對於食物的認識與態度，進而思考飲食文化如何形構觀念與思想。他最新近的著作，《中國思想：從孔子到庖丁》(*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Cook Ding*)³⁰，更進一步將呈現了儒家、道教、法家如何影響中國現代文明及現代人的思維。

高奕睿 (Imre Galambos)，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戰國時期的思想與文化。在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從事敦煌研究十年，於 2012 年進入劍橋大學任教後。目前，他除了組織每週一次的敦煌學交流會，專長及指導領域還包括中世紀中國史、文字學、金石學、唐代研究等。他先後出版於 2015 年與 2018 年的著作《譯寫與教授：黑水城的寫本與印刷書》(*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寫本與朝聖者：有關十世紀佛教朝聖者的漢藏文獻》(*Manuscripts and Travellers: The Sino-Tibetan Documents of a Tenth-Century Buddhist Pilgrim*)，都是建立在他對語言學與抄本文化的知識整理而來。

另外，周越 (Adam Yuet Chau) 與 Noga Ganany 分別專長於宗教與民俗文化的學者，也是劍橋漢學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從東方系成立之初，劍橋大學就投入於漢語言、文字的研究，如今在該領域擔任教學與學術工作的是 Boping Yuan，他於 1988 年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 (British Council) 的獎學金後，前往愛丁堡大學完成了應用語言學 (Applied Linguistics) 的碩、博士學位。

除了編撰漢語字典，Boping Yuan 的研究側重漢語作為第二外語時的學習與運用，包含非母語漢語的語法、句法和語義等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non-native Chinese grammars、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formal linguistics、syntax and semantics)。

(三)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與多數擁有漢學教學機構的大學不同，當然也與其本身的漢學傳統相異，劍橋大學在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上還顯得相對年輕。

殷海潔 (Heather Inwood)，從劍橋大學畢業後赴北京的清華大學交換，爾後分別在北京大學與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完成碩士與博士研究 (2008)。2016 年返劍橋前，她曾前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和曼徹斯特大學任教。在第一本專書《詩歌走紅：中國的新媒體現場》(*Verse Going Viral: China's New Media Scenes*)³¹ 裡，她考察了中國的當代詩歌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如何在市場經濟、公共關係主導以及網路平台、社群盛行的社會保持活力。而從她近年發表的文章與指導學生的領域來看，她的研究視角也遍及香港與臺灣的社會文化，在文本類型上，她的研究對象還有網路文學、當代電影、媒體話語等；在學術研究之外，她也是 BBC 雜誌的作者，並在 ABC 體育、MTV 中國等組織擔任翻譯。

五、「批評迴流」(The Backflow of Criticism) 與「隔膜效應」(The Diaphragm Effect)

「批評迴流」(The Backflow of

Criticism) 與「隔膜效應」(The Diaphragm Effect) 是楊尚在評述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時提出的概念，前者以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等學者為例探討了海外漢學對於兩岸三地中國文學研究之間的互動或影響；後者則從「普夏之爭」兼論「漢學心態」側重展現了不同地域的研究者在方法、意識形態上的差異。³²當然，這並不是評價、褒貶海外漢學影響力高低的標準，但倘使以此來審視如今英國教育與研究機構中的漢學，會發現它與中國文學在其本土的研究之間，不論在「流」還是「隔」上的強度都不及北美漢學。

在我看來，首先是由於英國漢學相關的研究人員（特別是從兩岸三地出國留學後得以獲得教職的）³³，在數量上本就不及北美，加之他們分散在少數幾所學校的不同系所（並不局限於「Chinese Studies」），在領域內常是「單打獨鬥」的狀態，也就更少以集體的方式直接與兩岸三地甚至東亞其它地區的學校、學界互動；其次，英國當地的漢學機構、團體、刊物亦相對少於北美，也就意味著鮮有平台提供研究者切磋、交流。甚或可以說，在所謂的「流」裡，北美漢學才是與英國漢學形成二元組合的對象（這從《劍橋中國史》的編寫也能看出）；而英國漢學裡的「隔」，在某種意義上，也因此是由北美漢學或是歐洲（尤其是德國）漢學與中國文學研究間產生的「隔」演化發展而來。

其次是被兩岸三地國學研究者或是海外漢學家所廣泛詬病並呼籲改善的英國漢學中的「功利主義」，即越來越將其簡化為以實用為目的的工具，僅以近年來大學院校中「Chinese Studies」的課程與研究分佈

來預測，其實未來將愈發難以避免——類似「中國通識」的教育無疑更能滿足全球貿易的需要。另外，也因為前述的研究體系上的尚顯微薄，本作為獨立學科的漢學，往往被切割進哲學系、歷史系、考古系、人類學系或比較文學系等，或言之，它呈現出來更多的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體式，不過就目前進行中的研究項目與主題來看，這也使得英國漢學有時在研究方法上縱向地延伸到更細膩深刻的專業體系、在討論層面上拓展出中國文學本土研究所無法兼及的視角。

因此，英國漢學的「批評迴流」與「隔膜效應」大抵還在形成之初但無疑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在大學院校中漢學學科分配與建設上卻已然能引發許多思考。

註解：

1. 關於英國從 13 世紀認識、建構中國形象到 18 世紀中國茶葉、瓷器的風靡而產生「中國熱」，英國的早期漢學發展，可參見趙欣：《十八世紀英國漢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計翔翔，2008 年）。
2. 英國漢學在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文論上的研究發展，可參見黃卓越：《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英美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
3. T. 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London: Wellsweep, 1989).
4. 相關編目可參見王珂：《大英圖書館中文寫本專題敘錄與個案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王承略，2019 年）；另外，館藏的外交檔案與信札名帖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參見王天

- 根：《不列顛圖書館藏近代中英關係珍稀史料研究》（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19年）。
5. 如 Stephen McDowall 對愛丁堡大學圖書館館藏的《周易傳義大全》的書目說明：〈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the Early-Ming Copy of the Zhouyi zhuan yi daquan at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Library〉，參見：<http://bacsuk.org.uk/wp-content/uploads/2014/10/MacDowall.pdf>；Xiaofan Amy Li 以「遊」作為關鍵字對《莊子》與六朝文人寫作的研究：〈Playful You in the Zhuangzi and Six Dynasties Literati Writing〉，參見：<http://bacsuk.org.uk/wp-content/uploads/2018/07/JBACS-8.2-Li-1-28.pdf>。Britis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中其它論文、書評等，參見：<http://bacsuk.org.uk/journal/journal-current-and-past-entries>。
 6. 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1823年在倫敦成立，旨在建立對亞洲科技、藝術與文學的研究與交流，參見：<https://royalasiaticsociety.org>；該會在香港（1847，參見：<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hk>）、上海（1857，參見：<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cn>）、北京（2013，參見：<http://www.rasbj.org>）等地設有分會。需說明的是，從 RAS 在中國分會的年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來看，人文藝術學科的研究比重相對較大，參見：<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cn/publications/>。
 7. 關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漢學相關的研究領域、研究機構如珀西瓦爾·戴維中國藝術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圖書館藏（包括馬禮遜藏書等）、研究著作、學術刊物如《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的概述，參見牛雲平：〈當前英國的中國學研究：現狀、特點與思考〉，《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5期（2008年），頁17-23。
 8. 關於這三份報告的內容與影響，參見李真：〈簡述20世紀初期至今的英國漢學〉，《人文叢刊》第3輯，（2008年），頁357-367。
 9. 「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這兩個概念的邊界與差異，至今尚無明確的定義，但通常，對於20世紀以前的海外漢學，仍以前者指稱。關於二者的辨析與因應不同研究對象時的區別，參見方維規：《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歐洲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10. 參見：<https://www.prospects.ac.uk>。不過，「Prospect」是由學校付費登錄學位、學程的網站，因此搜索結果並非遍及英國所有大專院校及其科系。
 11. 參見：<https://writingchinese.leeds.ac.uk>。
 12. 關於「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在英國的研究近況，可參見林佩瑩、傅揚：〈近二十年英國的中國古代暨中古史研究概況〉，《早期中國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16年），頁185-217。
 13. 如「當代中國的生命週期」(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 Cycle: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由 Mark McLeister 授課。
 14. 包含唐詩、宋詩、明代白話小說、現代詩、現代小說等課程，由 Julian Ward、Xuelei Huang、Christopher Rosenmeier 授課。
 15. 如「1978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Post 197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國與東南亞的國際關係」(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由 Daniel Hammond 授課。
 16. 參見：<http://www.confuciusinstitute.ac.uk>。

17. 全文參見：<http://bacsuk.org.uk/wp-content/uploads/2018/07/JBACS-8.2-Ward-63-88.pdf>。
18. Xuelei Huang, *Shanghai Filmmaking: Crossing Borders, Connecting to the Globe, 1922–1938* (Brill:Leiden,2014).
19. Xuelei Huang, “Deodorizing China: Odour, ordure, and colonial (dis)order in Shanghai, 1840s – 1940s,” *Modern Asian Studies*, 3(2016), pp. 1092 – 1122. 全文參見：https://www.research.ed.ac.uk/portal/files/18765550/Huang_Deodorising_China_AFV.pdf。
20. 林佩瑩、傅揚：〈近二十年英國的中國古代暨中古史研究概況〉，《早期中國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16年），頁185-217。
21. Craig Clunas, *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柯律格著，梁霄譯：《誰在看中國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
22. Tian Yuan Tan, *Songs of Contentment and Transgression: Discharged Officials and Literati Commun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North China* (Massachusetts: Harvard, 2010).
23. Dirk 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2).
24. Margaret Hillenbrand, *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the Practice of Resistanc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Fiction, 1960-1990* (Leiden: Brill, 2007).
25. Margaret Hillenbrand, *Negative Exposures: Knowing What Not to Know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6. 關於劍橋大學的漢學及劍橋漢學（兩者並非全然相同的概念）在20世紀以前的歷史與發展，參見關維民：〈劍橋漢學的形成與發展〉，《國際漢學》第1期（2004年），頁192-218。在這篇論文中，還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從由理念劍橋大學《學生手冊》所記錄的中文入學試卷內容可看出，劍橋大學的漢學在1940年之前，以中國經典（四書五經）等為基礎，爾後漸漸開始側重中國歷史的研究。
27. 課程中的研讀文本主要是中國中世紀到晚清之間的小說、詩歌及散文。
28. 胡司德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Roel Sterckx FBA, *The Animal and the Daemon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29. 胡司德著，劉豐譯：《早期中國的食物、祭祀與聖賢》（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Roel Sterckx FBA, *Food, Sacrifice, and Sagehood in Early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Roel Sterckx FBA, *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Cook Ding* (London: Pelican, 2019).
31. Heather Inwood, *Verse Going Viral: China's New Media Scen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32. 楊肖：《論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33. 英國漢學學會（BACS）提供的報告（Report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China-related Studies in the UK），大致呈現每年英國從事中國研究（不僅限於文史哲）的博士生人數、國籍等基本狀況。2018-2019年度的報告，參見：<http://bacsuk.org.uk/wp-content/uploads/2015/05/BACS-State-of-the-Field-2018-19.pdf>。



專題企畫



相關訊息

臺灣中文學會新書精讀計畫之三十一預告 ——林遠澤《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

一、會議資訊

1. 主辦單位：臺灣中文學會
2. 合辦單位：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3. 時間：109年9月26日（週六）14:30-17:00
4. 地點：東海大學東海書房
5. 主持人：馮耀明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6. 主講人：林遠澤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7. 討論人：（依姓氏筆劃順序）
周明泉教授（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楊儒賓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哲學所講座教授）
劉滄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8. 聯絡信箱：g08110101@tdrive.thu.edu.tw

二、專著資訊

1. 閱讀專著：林遠澤《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2. 內容簡介：

學者林遠澤最新論著，參酌批判理論的道德發展理論版本闡明儒家做為一種後習俗責任倫理學，如何能在結合正義與關懷的仁學基礎上，提出以正名論的道德文法學，建構禮治社會的實踐理想。

儒家在兩千多年前，以批判習俗道德、追求社會革新的姿態，站上中國歷史的舞台。但曾幾何時，它在今日卻普遍被進步的知識分子與年輕學子，視為是傳統守舊的文化毒瘤。儒家訴求重構社會體制的批判動能如今安在？探討儒家的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理念，即是試圖闡明，儒具有何種批判的潛能，以至於他們在訴求超越習俗道德之後，還能負責任地提出應如何重構社會體制的理想藍圖。《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並不是為傳統儒學申冤而寫的辯護狀，而毋寧是一封想寄給未來儒家的邀請函。透過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闡釋，邀請每一位致力於推動文化革新的現代公民，站在原始儒家的批判立場上，共同面對重構當代社會體制的思考挑戰。



相關訊息

三、報名資訊

1. 報名資格：人文學科相關系所和研究機構之教師、學者、學生。
2. 人數：30 名，若超額則以臺灣中文學會會員優先錄取。
3.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30 日（週日）止，請於線上填寫表單：
<https://forms.gle/L9RkT7gLsEAsKxnw5>。
4. 書籍購買：請自行至網路書店或是實體店鋪，購買此次精讀會書籍《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第八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公告

一、申請資格：

108 學年度（108 年 8 月至 109 年 7 月）中文學門相關系所（國文、中文、華文、臺文、經學、漢學、文獻等系所）博士班應屆畢業生。

二、申請程序：

- （一） 填具四賢博士論文獎申請書壹份（請自行至本會網站下載）。
- （二） 檢附學位證書影本壹份。（若於申請期間尚未取得學位證書，至遲應於 9 月 10 日前以掛號方式寄至本會）
- （三） 論文紙本參份並將 PDF 檔上傳至 <https://forms.gle/AEHNZqfzwUGvnpZy5> 。

三、備審資料一律以掛號郵寄至：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臺大中文系，梅家玲教授收，信封請註明「申請臺灣中文學會四賢博士論文獎」。

四、重要時程：

- （一）公告時間：6 月 10 日前。
- （二）收件時間：6 月 10 日開始收件，8 月 20 日截止（以郵戳日期為準）。
- （三）審查結果：10 月於本會網站公告。
- （四）頒獎方式：於本會 109 年度年會暨會員大會公開頒獎。

五、本獎項先由本會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初審，再送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審查，並經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得獎名單，如無適當人選得從缺。



相關訊息

編後語

◎秘書處

溽暑盛夏，承蒙各方會員的幫助，秘書處正密切籌備十月的年會，以及其他各項學會活動。本期會訊「會務報導」收錄一場常務理事會議紀錄，討論十月年會、明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新書精讀會的時程。

本期「活動紀實」為新書精讀會第三十場講座，由陳英傑主講《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假政治大學進行遠距視訊，陳教授由杜詩學的角度來討論明代復古派的模擬問題，並提出從李夢陽至許學夷的「復古派詩學系譜」觀點。復古派學古的具體對象為杜甫詩，從「學杜」、「尊杜」、「攻杜」等問題，展現出復古派的詩論面貌差異，以此挖掘擬作的意義，梳理明代的文學典範。與談人對此議題也提出多面向的迴響，再度引領讀者去思考模仿與創造在詩學傳統中的作用和意義。

本期「專題企畫」收錄兩篇海外漢學簡介。首先由賓州州立大學傅朗（Nicolai Volland）教授介紹「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學會」（ACCL）成立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其間得力於樂黛雲、吳北玲、李歐梵等學者的努力。ACCL 雙年會為英文與中文學術界之間的橋樑，由與會者逐年累增，可見中國文學研究在歐美的迅速發展，而雙年會的論文更呈現出對台灣、香港、東南亞等華語語系文學的關注。從中可見一個有願景的學會長期深耕經營的努力。

第二篇由倫敦大學博士生張夢雲撰寫

「英國漢學的現狀與發展(2010-2020)——以大學（學院）中的研究機構為例」詳細介紹了英國各學術機構的漢學研究方向、學者的研究專長和著作，以及各圖書館的收藏特色。英國各大學的漢學師資、授課及研究領域各有側重，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漢學研究機構、愛丁堡大學的華人電影研究、牛津大學柯律格的中國物質文明史、劍橋大學的歷史思想領域等，別具特色。由於英國漢學研究者數量不及北美漢學，與其他各國漢學界亦少有交流，相對邊緣，但也因為被劃入到考古、歷史、人類學等各學科，而呈現出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在研究方法上或有本土中文學門所無法兼及的視角，值得借鑒參考。

臺灣中文學會致力推動中文學門的連結與發展，目前第八屆「四賢博士論文獎」正在徵件中，第三十一場新書精讀會將於9月26日（週六）在東海大學舉行，閱讀林遠澤教授著作《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此外，臺灣中文學會年會暨第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將於10月24日（週六）由成大中文系承辦，議題為人才培育與課程規劃，期待舊雨新知共襄盛舉。



相關訊息



發行人：梅家玲
編輯者：臺灣中文學會祕書處
執行編輯：佘筠珺、鄭雅平
創刊：民國 101（2012）年 4 月
會址：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